

臺大歷史系講論會

明嘉靖朝禮制改革的性別史考察

衣若蘭老師主講

關於明世宗期間（1507-1567, 1521-1567 在位）實施的禮制改革，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，惜較被忽略的是親蠶禮的設置。此為國家大典中少數由皇后主持的祀典，是一對應於天子親耕、鼓勵農桑生產之象徵性儀典，中國歷代朝廷多行之，至遼、金、元殆廢，十六世紀中葉明世宗又短暫恢復。

嘉靖皇帝為何要舉行明代開國之初未曾實施的親蠶禮？朝臣對此事的反應為何？親蠶禮的討論、進行以及地點的選擇等方面，呈現了何種性別意涵？過去有關嘉靖禮制改革的焦點多集中於政治與禮儀兩大方面，本文則試圖從性別的角度來考察明代親蠶禮的議論與實施，期待以此為例，進一步瞭解嘉靖更定祀典的相關議題，並對禮儀史的研究提供另一觀察之視角。

禮制的制訂與執行，屬於政治的範疇，與朝政相關，然其中亦可窺見性別意涵。中國禮制的功能有正人倫、定尊卑之意，隱含了儒家人倫秩序中對於男女角色與行為之約束，實為一性別議題。嘉靖朝親蠶禮實行的本意、過程及其議論，均可見性別之意涵。性別因素在親蠶禮的議論中可能被操弄，用來作為滿足國家政策、伸張皇權，以及官員表達己欲之工具，亦可強化官方與士人對婦德的想像與要求。

而本研究中涉及禮儀之細節及其所反映的婦德、內外界線與傳統中國的宇宙觀，將可補充明代宗教史之相關探討。另從主祭者、輔祭者、負責養蠶之平民蠶母等女性參與親蠶儀式的情形，亦可思考性別與禮儀空間之議題，為性別史的研究擴張視野。

未來或可進一步探究勸課農桑之禮在東亞與歐洲的意義。日本八世紀的「初子儀式」乃是籍田與先蠶的合併之禮，近年日本天皇與皇妃亦親自操演農桑。朝鮮李氏王朝自 1400 年開始有祭祀中國西陵氏的儀式。然有趣的是，十八世紀歐洲君主如路易十五仿效中國的籍田之禮，卻沒有實行皇后親蠶禮，其原因何在？由此比較的視野反觀中國文化，將有另一番意義——中國社會將紡織與婦德緊密聯繫，即是性別文化中的一大特色。

總之，本研究希望能由性別探究禮儀史，並由親蠶禮考察性別與政治之關係，希冀稍補中國政治與禮儀史研究中可能忽略的性別面向。



▲衣若蘭老師（2011年11月3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）



講論會/演講摘要

從一件託名為徐光啟之作談天主教之何謂藝術

陳慧宏老師主講

耶穌會士明末清初到中國時，帶來不少聖像，這從零星實物或文獻紀錄都已證實，不過其中關於聖像的紀錄不甚具體。檔案中似乎只能得知聖像的主題名稱或部分好壞的品評，僅從實物的遺存更無法進一步建構具體的脈絡。在宗教改革的年代中，不論教會或耶穌會組織，對待聖像的傳統雖是相當護衛，卻不易看到兩者的具體因應策略。在十六世紀末，天主教教會在歐洲的傳教，基本上也沒有特定的策略。我們可以觀察到教會面對異端或海外異教的原則，卻很難看到如何的指導方針在實際上適用在不同的地區。

約自 1990 年代到 2000 年左右，學者們的研究大致認為耶穌會可能沒有所謂的特定風格，但也不是全然對藝術冷漠的傳教士，在中國傳教區看到的藝術品評紀錄之多樣，即可呼應此點。不過，傳教士確實用聖像作為傳教媒介之一，但他們似乎從不提供具體可循的方法，聖像到底在天主教引進中國時，扮演何種角色？不論從實物或文獻推論而來的數量，都不足以解釋其絕對的重要性。但若是重要，是相對於何者而重要？圖像雖可帶領中國人進入非語言論述的理解情境，但耶穌會士從一開始也不斷強調學習當地語言的重要，這是他們在印度、日本、和中國三個地區不變

的原則。換言之，若要說傳教士不忘使用圖像，但他們也不斷地學習當地語言，圖像並未取代語言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圖像是否只在特定脈絡為特定目的而用？

本人對聖像在中國傳教區之絕對重要性的質疑，似乎可從大批的傳教士中文著作得到驗證。傳教士中文著作是相當重要的一手史料，相關研究還不太多。其中專門論及天主教聖像的只有以下討論的這兩件，和另兩件結合圖版的出版品。傳教士有時甚至只是將聖像當成小禮物而已。

以下討論集中於一件託名為徐光啟之作。這個文本可衍伸出明末士人對聖像議題的討論，但其內容卻可能是針對非士人的一般大眾。這部分可聯繫到歐洲護教文本中對圖像解釋的討論。歐洲護教文本如 Molanus 之作，是 1570 年左右出版，中文傳教士著作與其呼應大約是 1615 年起。什麼圖像在中國被使用，其解答似乎並不在圖像的風格，而在護教文本和圖像母題這一線索上。



▲陳慧宏老師(2011年12月1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)



講論會/演講摘要

馬內的兒童肖像與十九世紀中期的
巴黎資產階級家庭

劉巧楣老師主講

愛德華·馬內 (Edouard Manet, 1832-1883) 的兒童形象，在數量與類型的變化上，都超出了當今藝術史研究的視野。他向來被視為巴黎第二帝國時期現代生活的代表性畫家，作品主要描繪都市人物與娛樂。然而，這並非馬內作品的唯一特點，事實上，在整個創作生涯中，他描繪了當代兒童生活的許多面向，例如著名的《杜樂希花園音樂會》(*Music at the Tuileries*, 1861. London, National Gallery)，在新都會的資產階級休閒社交活動之間，穿插著兒童的遊戲活動。他觀察活動於各種都市空間中、不同年紀與階級的兒童，包括肖像、街頭音樂家、僮僕、私人或公共花園中的女孩，以及遊蕩的青少年。我們應可預期馬內的兒童形象因年代與題材而表現不同的內容，而非全都具有單一明確的社會主張。

另一方面，以更寬廣的童年史研究而言，由馬內的兒童形象數量與類型來看，這批作品共有 100 件以上的油畫、粉彩畫、素描與水彩，數量相當可觀，相較於常見的零星圖像或自述文獻，是一批相當充分的研究材料，也可以突破通論研究的化約性。然而，馬內的兒童形象並未受到藝術史與文化史學者充分重視。本文擬從前述三大類型中選取兒童肖像為主題，進行具體的個案研究，藉以建立比較紮實的社會文化脈絡。



▲劉巧楣老師（2011 年 12 月 29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）



▲本系 100 學年度講論會主持人花亦芬老師（右）與劉巧楣老師



▲講論會現場即景

